

贝多芬的最后十年

与凡·贝多芬先生的对话

卡尔·施内茨

35.1657
8



人民音乐出版社

Karl-Heinz Köhler
“...tausendmal leben!”
Konversationen mit Herrn van Beethoven

本书根据莱比锡德国音乐出版社
1980年第二版译出

贝多芬的最后十年

——与凡·贝多芬先生的谈话

〔民主德国〕卡尔·海因茨·克勒著

顾耀明译 高更夫校

*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30千字 6.25印张

198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155册

ISBN 7-103-00305-x/J·306 定价：2.10元

原出版者的话

此书是一篇关于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最后十年的生平报导。在《与凡·贝多芬先生的谈话》*一书中论述的一切，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他这篇报导是以那些经过科学验证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的，其中包括那份独特的、绝无仅有的资料汇编：谈话簿。

“我在此世就一定要你们看到我得到幸福，决不要苦恼。——不，这是我不能忍受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休想使我完全屈服。——噢！生活，多美啊，活上千百次吧！”这是三十一岁的贝多芬在1801年觉察到自己耳聋症状有进一步加剧的倾向之后，写给他青年时代的一位朋友信中的一段话。十五年以后，他完全失聪了：这对一位作曲家来说是多么可怕的命运！朋友和来访者只有把他们的愿望写在随时随地备着的本子上，才能与他沟通思想。贝多芬去世时，这类本子达到400余本之多。

贝多芬的“埃克曼”^①，安东·兴德勒在整理遗物时得到了这些谈话簿。他剔除并销毁了其中“无关重要的”部分，然后把“值得流传的”部分卖给了柏林王家图书馆。

我们现在保存的共有137本。里面记录的谈话内容使我们能

* 本书原名《“……活上千百次吧”——与凡·贝多芬先生的谈话》，中译本改为《贝多芬的最后十年》。——译注，下同。

^① Eckermann, 德国伟大的诗人、作家歌德的助手与秘书。

够饶有趣味地了解贝多芬的生活与思想。但是为了便于理解，这些谈话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翻译，因为它们尽是些片言只语——落笔者常常才提了个头，贝多芬就心领神会了——而且落笔者经常更换，话题也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

为写此书，音乐学家、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音乐部主任、谈话簿十二卷科学版的出版者之一，卡尔-海因茨·克勒根据内容概括了原文，把它们补入贝多芬的传记，并给他的这篇报导穿上了中篇小说的外衣。因此，这门在外行看来往往是干巴巴的学问在此书中却显得生动有趣了，全书时而绘声绘形，时而妙趣横生，读来引人入胜。

前 言

一个正在打电话的人的情形，我们一定是不难想象的。作为这场通话的旁观者，我们也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场景。我们虽然可以听见这个正在打电话的人在说些什么，回答对方些什么，但是，无法知道对方回答的原话。然而我们一般可以知道，这里在谈论些什么，甚至还知道，这个无法听见他原话的伙伴持什么观点。我们正在观察的这位打电话的人，他说话的方式方法、他的脸部表情、他慷慨激昂或沉着冷静的情绪都历历在目。假如我们现在只把我们可以听见的那部分谈话记录下来(略去其中帮助理解讲话的成份，如手势、表情和应诺声等)，那么，我们就获得了一份文字材料，它使我们看到了这次通话的许多词句，然而始终没有回答的话。那些流传给我们的，与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最后十年的谈话同这份文字材料的性质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这位双耳失聪的作曲家递给来访者和朋友一块蜡板或一张折成本子的纸，叫对方写下他们的意见、提问和回答。上面一般没有贝多芬自己的话——因为他可以讲话。这些谈话即便详加注释，局外人也几乎无法看懂，因为话题变化无常，在一般的谈论之后会突然出现重要内容，为了理解这些笔记，必须摘引的书信和传记又数不胜数。

因此，此书试图把贝多芬在最后十年间最重要的谈话按时间

顺序分门别类，使读者了解这些谈话的戏剧性的核心。因为，谈话簿所包含的内容确实是富有戏剧性的。1846年，贝多芬的朋友安东·兴德勒把遗留下来的四分之一的谈话簿卖给了柏林的“王家图书馆”。即现在的德国国家图书馆。

现已明确的重要的传记性段落有：从1819至1820年的谈话中可以了解有关侄子卡尔监护权的诉讼高潮；可以了解在1823年创作《第九交响曲》的岁月里，许多有趣的会见和作出的决定；次年春天，围绕这部作品的初演发生了一场风波；另外，我们从中还可以了解到这位大师在1825至1826年间创作的晚期四重奏的命运，他收为义子的侄子自杀的悲剧，以及这位天才延续了四个月之久的重病。这些传记的每个片段都有一些特殊问题，并且根据各自的特点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体。但是，除了这些有关传记性的章节以外，各种题目的谈话几乎贯穿于所有的谈话簿中：大量的书名摘录使人看到贝多芬对文学的兴趣，那些他常常满怀激情地在自己的藏书中划满一条条粗杠杠的段落，也许就是对这些摘录最好的补充；他们谈论艺术、诗歌和音乐，谈论当时的大人物、政治和历史——贝多芬经历的这几十年，正是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蓬勃发展，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制度土崩瓦解的年代，然而，贝多芬是法国革命、拿破仑及其胜利和失败的同时代人，也是梅特涅以及西班牙、意大利自由党人起义和匈牙利、俄罗斯、葡萄牙起义的同时代人。

所有这些谈话内容——都由许多其它的文献来证实和补充——现在经过分门别类的编排，构成了这位作曲家的肖像，这幅肖像在他众多的肖像中也许是极其新颖别致的。当然，缺陷显然是存在的，明智地填补这些缺陷和整理有关文献就只能依赖作者的想像了。于是就出现了描写，让诗歌、小说、流传下来的文献及其解释互相补充。

贝多芬周围的朋友曾经说：人们可以议论伟人的一切，这于他们毫无损害。但是，无论写哪位天才人物，都应当说明理解他们作品的方法，这样，这个生平就十分充实和完美了。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孩子之争.....	(1)
第二章 “这支小小的蜡烛，它的光照得多么远” 书与诗	(23)
第三章 创作大交响曲的岁月	(36)
第四章 “喜欢海顿，更喜欢莫扎特” 传统与榜样	(61)
第五章 大型音乐会	(90)
第六章 “假如拿破仑现在又来了.....” 政治与历史	(111)
第七章 四重奏的故事 1825年的情景	(132)
第八章 “什么时候出的事？” 最后几年的悲剧	(154)
令人瞩目的谈话簿——代跋	(175)

第一章

孩子之争

1815年11月15日，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一生中最严重的危机之一爆发了。而这位年已四十五岁的大师仍孑然一身，膝下无子。前一天，他一直守候在比他小四岁的弟弟，卡斯帕尔·安东·卡尔的病榻前。1795年，卡尔同他的弟弟尼古拉斯·约翰一样，随贝多芬来到了维也纳。为了两个年幼的弟弟，路德维希在母亲早逝(1787年)之后，不得不真正挑起又当爹又做妈的重担，因为他们的父亲意志薄弱，酗酒无度，无法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何况他五年之后也去世了。这些年间，贝多芬为他的弟弟所作的牺牲，人们几乎一无所知。对两个兄弟的关心照顾，也许就形成了贝多芬参与决定他们今后生活道路的某种权力，主要在职业和妻子的选择上。

贝多芬肯定对两个兄弟职业上的发展产生过影响——卡斯帕尔·卡尔在奥地利国家银行当出纳员，而尼古拉斯·约翰选择了药剂师这个职业。毫无疑问，他们力图迅速摆脱长兄若父式的监护，特别在择偶时自作主张了。由于不由自主地失去了这种父亲式的地位，贝多芬感到很痛苦，与兄弟们的关系时常闹得很僵，对两个弟媳的怨恨也与日俱增。他自身的状况——尤其是他日趋严重的耳疾——又不允许他自立家庭，这更激化了他与兄弟家庭的别扭关系。这种关系也许更能解释后面描写的那些事件，因为它们时常与贝多芬精神上的创造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里，特别

使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个人的矛盾和危机对精神创造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1806年，贝多芬的弟弟卡斯帕尔·安东·卡尔与裱糊匠的女儿约翰娜·赖斯结了婚。这个弟媳显然不是贝多芬理想中的妇女形象，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我们可以想象，她是一个热情奔放、有生活乐趣、喜欢玩乐的维也纳女子。此外，她还对自己的利益斤斤计较，而精神境界却不高雅。结婚那一年，她生了个男孩，取了与他父亲相同的名字。贝多芬在1820年2月的诉讼呈文中，给他的弟媳描绘了一幅阴沉的肖像：“……尚未出嫁时，她就在警察局亮过相，因为她告发她的女仆是某件事的作案人，声称自己只是个帮手而已，结果，女仆被宣告无罪……。1811年，虽然她已做了妻子和母亲，但还极为轻浮、放荡、固执、恶毒，也不顾及自己已经不太好的名声，又干出新的、骇人听闻的坏事，甚至被传上刑事法庭；在刑事法庭上，她又把那些无辜的人扯进她干的丑事之中，最后又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唯一的作案人。她虽然受到处罚，但在她丈夫及其朋友的多方努力之下，总算没有身陷囹圄，又被释放了。这种可怕的事使我那业已去世的兄弟当时害了一场重病。从此，他一直缠身病榻。只是在我善意的帮助下，他的生命才勉强维持了一段时期。在他临终前，她又瞒着他拿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钱。这件事促使我兄弟想要与她离婚，只是死神降临了，使他离开了人世。那时正是1815年的11月15日。”

因此，贝多芬的兄弟与他那位触犯法律的妻子约翰娜的婚姻并不美满。为了证明自己对兄弟托付给他的侄子卡尔享有父权，贝多芬作了夸张，但是，他在那份确有偏见的呈文中究竟夸张到什么程度，还有待研究。对于非理性的要求需要作理性的解释。而约翰娜·凡·贝多芬的生活作风也许可以使贝多芬较容易地作

出这种解释。在主要当事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确实可以找出兄弟卡尔在立遗嘱时态度动摇不定的原因，正是那份遗嘱使这件诉讼案拖了五年之久并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卡斯帕尔·安东·卡尔遗嘱的第五条写明：“除了我妻子之外，我指定哥哥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为共同监护人。我衷心爱戴的哥哥一向怀着真正的兄弟之爱，给予我最宽宏大量、最高尚无私的支持，因此我也无比信赖他那崇高的心灵，并且充满信心地希望，他今后在我儿子卡尔身上也能倾注过去常常向我表示的爱和友谊，并为我儿子的心灵教育和今后的发展尽心竭力……。”另一段规定，遗产由他妻子和儿子平分。在此之前，即1813年4月12日还立过一个遗嘱，其中指定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在他弟弟早亡的情况下为他侄子唯一的监护人。1815年11月14日的遗嘱条文修改了这一条，变为弟媳享有共同监护权。在探病时，贝多芬恳求临终的卡尔恢复原来文本中的那一条，他也这样做了。但是，贝多芬离开病人之后，约翰娜指使在场的律师写了遗嘱附言，卡尔的母亲又被指定为共同监护人：“因为我发现，我哥哥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先生可能在我去世之后，要单独领养我的儿子卡尔，并剥夺他母亲对他照料和教育的权力，而且我哥哥和我妻子意见不和，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对我的遗嘱作些补充，我完全不希望我儿子卡尔离开他的母亲，而是希望他无论如何都要留在他母亲身边，只要他未来的命运容许这样做。因为，他母亲会象我哥哥一样很好地行使对儿子的监护权。只有两个监护人的意见一致，才能达到我在确定哥哥为我儿子的监护人时所认定的那个目标。因此，为了我儿子的幸福，我建议我妻子要谦让一点，我哥哥要多克制一点……。”

同一天，贝多芬再去探望卡尔时，发现了这条增补内容，又坚决要求恢复原来的遗嘱条文。他还亲自去找律师，要他修改，

但没能找到。

五年之后，他在上面所提及的呈文中叙述了这个过程：“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指定我为他儿子唯一的监护人，因为他在遗嘱中把我当作恩人，感激不尽。我离开他只有一会儿，但是当我又回到他的身边时，他告诉我说，在我离去的那会儿，有人补充了一些内容，并迫使他在上面签了字。（这是指那份遗嘱附言，她借此声称自己是监护人，还象我一样好。）他请求我即刻从律师那里追回这份遗嘱，只是在当天没能找到这位律师，尽管我应弟弟的请求到他家去了好几次。次日凌晨五点，我弟弟就离开了人世。”

因此，这场围绕一个九岁孩子的纠纷，在他父亲的病榻前就已经发生了。遵照遗嘱，贝多芬享有共同监护权，但他不予承认，也从未想去承认它。相反，他弟弟去世后不久，他就力求通过法院的判决宣布遗嘱附言无效。在向下奥地利州法院提交的呈文中，他指出，孩子的母亲约翰娜夫人不能、也不配享有监护权，因为她在五年前，由于“侵吞钱财”（没有细说），受到维也纳市参议院刑事法庭的审判。贝多芬占理了！1816年1月9日，“皇帝和国王陛下的下奥地利州法院作出判决：“……鉴于在卡尔·凡·贝多芬一案的审理过程中对目前情况的调查，本院指定死者的哥哥，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为他侄子卡尔·凡·贝多芬唯一的监护人。……”贝多芬初战告捷，对他享有的父权欣喜若狂。

这段时期所有的书信都披露了这件事，在通知他周围朋友的夫人时，叙述得特别详尽，因为他希望从她们那里得到充分的谅解。1816年5月13日，他写信去帕多瓦，告诉十三年来与他亲密无间的安娜·玛丽·埃尔德迪伯爵夫人说：“我弟弟的去世使我悲痛万分，然而后来，为了把我可爱的侄儿从他道德败坏的母亲那里拯救出来，我作了巨大努力，这件事办成了。只是迄今为止，除了送他上学之外，我还不能为他做更好的事，就是说，宁可让

他离开我，把他送到学校去，也不要让一个做父亲的拐弯抹角地去爱怜、关怀他的孩子，因为我现在就是这么个父亲；另外，为了能更快更有利地对他施以影响，我也反复思索，如何才能更亲近这个忠实于我的宝贝。”在给伯爵夫人的信中所说的那个学校就是卡耶坦·吉阿那塔西奥·得·里奥教育学校，这是一所专为贵族子弟开办的寄宿学校。因此，1816年间，贝多芬为他侄儿找到了维也纳一所最好的学校。在上述的法院判决后刚过一个月，他就把“他的小家伙”托付给得·里奥学校，贝多芬的侄儿在那里上了两年学。

因此，这个九岁半的男孩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三个半月就离开了他的母亲，住在有严格教规的寄宿学校里！而这位母亲在遭受了这一严厉的打击之后，能做的事就所剩无几了，而且还要做得合法。只要有可能，她就去看望年幼的儿子。孩子置身于母亲的影响、学校的教育以及贝多芬善意的愿望三者之间。他的学习成绩和举止行为同老师们的要求不相吻合。他们在贝多芬面前抱怨他弟媳来访过于频繁。不久，贝多芬请求法院再次作出决定：约翰娜只有得到贝多芬的许可才能去看望她的孩子！一切似乎都安排妥当了。

在这几个月里，贝多芬由于紧张而激烈的争辩几乎连一个音符也不能写。现在，他又开始写大型作品了。1816年4月，产生了声乐套曲《致远方的爱人》作品98号。在这位热爱生活的人的宽广的感觉世界里，这种接受了父权的愉悦心情，也许就不知不觉地与每首歌曲产生了共鸣。尽管这位艺术家在他的音乐表现中不会直接地再现他的这段经历，而只能对它作艺术的概括。生平的细节可以解释（但不必去解释），为什么一部艺术作品产生于某个特定时期，为什么它反映了特定的内容和内涵。

然而好景不长。贝多芬为他侄儿拟定的教育计划费用巨大，

甚至远远超出他原来的设想。而纠缠不休的继承遗产的事务也接踵而至，主要涉及的是他业已去世的弟弟的遗产。房子变卖之后——其中一部分是死者的财产——，贝多芬又设法在另一份根据法院判决而签定的合同中规定卡尔的母亲以适当的方式承担她儿子的一部分教育费用，因为她“根据法院判决声明，为了教育和赡养她的……儿子卡尔，每年向卡尔的监护人先生交纳钱款，一年四次，每次提前交付，每年的款额至少合约翰娜·凡·贝多芬寡妇夫人从国库中领取的养老金的一半，包括补助费或其它各有名目的收入。……维也纳，1817年5月10日——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签名)，约翰娜·凡·贝多芬(签名)”。

贝多芬就此与他弟媳打了三次官司，三次都打赢了。她失去了共同监护权；只能按照贝多芬的意愿去看望她的孩子，一月只有一次，还要有证人在场；最后，还得从她丈夫的遗产中拿出一笔相当可观的钱支付儿子的部分教育费用。就此一切，她企图报复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监护权给贝多芬带来的烦恼日益增多。卡尔的母亲违反法院对她的规定，一有可能，就偷偷地去看望她的儿子。要是不买通老师、女管家和侍女，这显然是办不到的。1818年1月24日，贝多芬把他的“儿子”从吉阿那塔西奥·得·里奥学校领了回来，并请一位“宫廷教师”，一位私人教师在自己家里给他上课。贝多芬为什么这样做，文献上没有记载。显然，他想把他留在身边，使他摆脱母亲的影响。侄儿与伯父初次朝夕相处的岁月给后世留下了这位大师的第一本谈话簿(1818年2至3月)。令人可惜的是，在贝多芬大动肝火的那一年里只留下这么一本，而且只有六页篇幅。可以证实，里面有卡尔最早的笔迹，是他对伯父平常教诲的答复：“我今天去过了。——这不会使我也象你一样吃香肠，因为已成习惯，也改不了了。——没有香肠只有肠衣固然也好，

但有了香肠，比只有肉更好。”一次无关紧要的谈话，一次对十二岁的孩子施以影响的教育。

贝多芬一般是在维也纳郊外的乡村度过夏天的，届时他放弃维也纳市内的过冬住房，在风景秀丽的市郊租一套新住宅。1818年的夏天，这位大师是在默德林度过的，女管家、侍女和侄子卡尔都陪伴着他。他把卡尔交给由弗勒利希牧师管理的默德林教会学校照管。一切似乎都非常正常。贝多芬又打算创作一部大作，《钢琴大奏鸣曲》作品106号。三年之后，他在写给他伦敦的学生费迪南德·里斯的信中说：“这首奏鸣曲是在令人烦恼的情况下写成的。”不过，贝多芬对这些情况和事件的恼火，超出我们的理解。约翰娜为了能一直看望她的儿子，买通了女管家和贝多芬的侍女。每当这位大师外出一边散步，一边作曲，长时间不在家时，她就乘虚而入。信号简单之极。要是贝多芬出门时间较长，女管家就把孩子的衬衣挂在窗上。一个知道这一秘密的小伙子就急忙赶到附近的维也纳新村，通知迁到那里的约翰娜，说声“空气纯净”就行了。用这种方法，她几乎每天去看她的卡尔，并教他说谎，这对他的成长和学业产生了不良影响，使他又在伯父与母亲之间动摇不定。但好景不长。一天，卡尔的母亲走近屋子时，贝多芬突然撞见了她，骗局揭穿了，结果大吵一场，贝多芬赶走了被收买的侍女。最后，弗勒利希牧师也建议他侄儿离开教会学校。

这时，贝多芬虽然还没感到绝望，但已怒火中烧。他感到自己被周围的人蒙骗了。在致钢琴制作家安德烈亚斯·施特赖歇尔的夫人的信中，他倾吐肺腑之言，明确地表露，他感到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多么不幸：“卡尔有错，但是——母亲——母亲——甚至一个坏母亲也始终是母亲。——就这点而言，可以原谅卡尔，尤其我会原谅他，因为，我看透了他那个感情强烈而又诡计多端的母亲……，这件事伤透了我的心，我无法再休养了……您不要外

传，因为别人会错怪卡尔的，只有我了解这里的每个细节，我可以为他作证，他是受了别人最可怕的诱骗……。我身体很不好。”因此，奏鸣曲作品106号就是在这种“令人烦恼的情况下”产生的。把这部大作理解为只是浮浅地反映了这个“令人烦恼的情况”，显然是不妥当的。但是，也许可以理解为这位大师通过艺术提炼对他所遇到的日益增多的烦恼的回答，理解为解放灵魂的精神净化，唯有它才能保持情绪的平衡。就这方面来说，贝多芬怒不可遏的情绪也许就是创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心理前提。——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耳疾使贝多芬不能正常地（只能绕一个弯，使用辅助方法）与他人接触。因此，他在与周围世界的矛盾冲突时也受到限制，不能摆脱精神负担。他的精神净化就靠艺术，就靠作曲。

乐曲开始的演奏，强烈、鲜明，和声丰满结实，表现了贝多芬对“令人烦恼的情况”的回答。在气氛紧张的延长记号之后，可爱的、充满渴望、柔情和思念的主部主题开始进入，随后消失在一串阿拉伯风格的装饰音型中，装饰音型节奏轻盈，演奏轻快、流畅，力度几乎一小节一小节地作断断续续的变化。这样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前者强硬、愤怒，后者亲切、柔美、如歌、温柔而富于表情。独具一格的赋格段贯穿于这个乐章的中部。乐思交织在一起，进入部分的音乐，以扩展和变化的形式进行反复，好象奏鸣曲主题的结构原则既对它作出规定，又允许它有艺术上的自由。诙谐曲的进入动机显得惶惶不安，它们似乎要努力组成一个长大乐句。最后，当它出现时，自由飘逸，音色变得黯淡了——乐句的进行由降B大调转为降 \flat 小调。短促而又技巧高超的急板又回到进入乐句，演奏由弱到最强，乐章结尾时，有几个小节又重复了这个过程。它又是一种矛盾冲突，表现得独具一格。这种矛盾冲突也贯穿于整个乐章。

持续的慢板优美动人，它也许是贝多芬笔下奔泻而出的最美妙的自由幻想之一，演奏要富于热情、情感及表现力（热烈、活跃而富于表情）。仅此乐章，就称得上是贝多芬最优美的钢琴作品之一，因为他把含而不露的表情和高超的技巧结合得天衣无缝。但是，给感情和激情留下的余地却不多。广板起始的终乐章，开头几小节——一直到最急板——就是从这种情绪出发，走向坚毅的快板，形成了赋格艺术的一部杰作。这首赋格曲（三声部赋格）起始于三声部，并未墨守成规，而显得较为自由，这种自由，就是让旋律的装饰从对位织体中解脱出来，从而又形成一种特殊的对比。终乐章里，特别有趣的是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作调性变化。开始是F大调，很快转为降B大调，最后转为f小调——然后又转到降G大调，降b小调，降A大调；在主要的乐段移向b小调，e小调，经过降E大调(!)回到F大调，以期在气氛紧张的全休止之后出现一个带有新的乐思的D大调小赋格，这个新的乐思转到开始时的F大调，充分利用和声的多种可能性，以致产生一种情绪激昂的结尾。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终止和弦中大、小调(降B大调和g小调)同时发出清晰的声响——演奏比较自由！在这个赋格乐章中，人们肯定可以看到贝多芬晚期作品风格的端倪。《钢琴奏鸣曲》作品106号把表现紧张的矛盾冲突、高超的钢琴技巧和结构自由的多种曲式熔为一炉，这在贝多芬的钢琴创作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作品的演奏和技巧上的控制足以使一切钢琴家望而生畏，从而被看作是钢琴演奏者的试金石。贝多芬于1817年开始创作这部杰作，中间经过1818年的春天和夏天（前面两个乐章），最后在1819年春脱稿（第三、第四乐章）。在这段漫长的创作时期中，“令人烦恼的情况”宛如他个人生活的对位，与他形影不离。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只了解了其中的一部分。让我们回到争夺孩子的斗争中来吧。